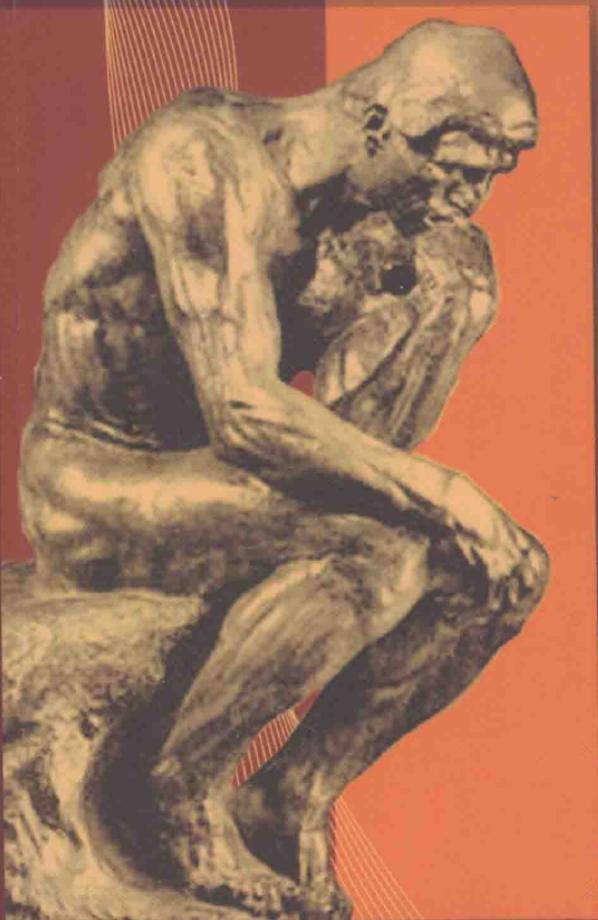


文学沙龙与

教育诗学

——当代沉思者访谈录

林幸谦



马悦然 王润华 白先勇 刘再复 朱经武 张大朋 陈永明 李欧梵 张信刚 陈映真 吴清辉 李锐 金耀基 徐立之 贾平凹 黄达人 蒋树声 詹世弘 潘宗光 痖弦 顾秉林

当代沉思者访谈录

文学沙龙与教育诗学



林幸谦

文学沙龙 与 教育诗学

——当代沉思者访谈录

作者 / 林幸谦

美术设计 / 余炽和

校对 / 编辑部

出版 / 星图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 马来西亚(总部)

Pluto Publishing Sdn Bhd
No. 2, Jalan Suria R U5/R,
Bandar Pinggiran Subang, Seksyen U5 BT3,
40150 Shah Alam, Malaysia.

电话 / (603) 7847 4829

传真 / (603) 7847 4639

分址 / 星图香港办事处

Pluto Publishing Sdn Bhd
P. O. Box No. 92187
Tsim Sha Tsui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印刷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出版日期 / 2007年11月 / 初版

2007年11月 / 第1刷

2008年4月 / 第2刷

定价 / 西马 RM35.00

东马 RM38.00

港币 HK70.00

上编

文学盛宴：当代作家言说

白先勇访谈

- ◎ 第三性、原罪与救赎 001
- ◎ 文化漂泊与文化解体的世纪 016
- ◎ 白崇禧将军的悲剧英雄形象 025

马悦然访谈

- ◎ 真理的美与美的人生 031
- ◎ 诺贝尔文学奖和汉学家生涯 040

张大朋访谈

- ◎ 红楼梦与文学梦的约会 048
- ◎ 企业家的文学追寻 055

陈映真访谈

- ◎ 中国的伤痛与台湾的认同悲情 061
- ◎ 恐怖主义与弱小者的全球化 067
- ◎ 殉道者的追寻与信念 072
- ◎ 人道关怀与生命的背离 081

贾平凹访谈

- ◎ 废都外的秦腔 086

痖弦访谈

- ◎ 诗的战神 093
- ◎ 一个诗人的创世纪 102
- ◎ 时代的盗火者 110

刘再复访谈

- ◎ 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116
- ◎ 流亡者的精神家园.....125

李锐访谈

- ◎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与普世意义 134
- ◎ 象形文和当代文学的纪念碑 142

李欧梵访谈

- ◎ 恋人絮语中的婚爱人生151
- ◎ 铁屋外的东方心灵.....163

下编

华人教育：导航者言说

王润华访谈：台湾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 ◎ 台湾高等教育的固守与灾难177

朱经武访谈：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 ◎ 科研与资源.....186

吴清辉访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 ◎ 社会智库、人文教育与大学合作机制的建构 192
- ◎ 全球化的多元特质与中华文化图象的振兴201

李欧梵访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 ◎ 大学的崩溃与沉沦中的铁塔尼 207
- ◎ 人文的消亡与消亡中的知识传统.....218

金耀基访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 ◎ 政治化 /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新战场225

徐立之访谈：香港大学校长

- ◎ 高科技平台与二十一世纪香港高等教育困境233
- ◎ 逆境、创造与科教重任244

陈永明访谈：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 ◎ 学店·学位贬值与大学分类议题253
- ◎ 打压、教改与中文危机 265
- ◎ 教育市场化与人格教育273

张信刚访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 ◎ 香港大学教育改革蓝图与未来社会发展 282

黄达人访谈：中国中山大学校长

- ◎ 素质教育与泡沫危机287

詹世弘访谈：台湾元智大学校长

- ◎ 大学资源分配的正义性与人文教育的振兴294
- ◎ 新世纪教育、大学整合迷思与教授治校的伦理危机 305

刘再复访谈：美国哥罗拉多大学教授

-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度向 316

潘宗光访谈：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 ◎ 财赤危机与教育失策下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困境 321

蒋树声访谈：中国南京大学校长

- ◎ 开创新兴学科与科研创新的时代使命332

顾秉林访谈：北京清华大学校长

- ◎ 中国高等学府的创新教育与大学改革 339

第三性、原罪与救赎

——专访白先勇谈同性恋者的时代挑战

在访问白先勇之前，笔者曾期待有朝一天会看到白先勇会以一个第三性作家身份记述自己的性别体验，为中国文学史留下当代非异性恋作家的性别铭刻之辞。笔者期待白先勇的笔锋有朝一日会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被长久忽略的、在异性恋霸权边缘的同性爱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其与众不同的性别体验铭刻在历史文化之中。我们期待，白先勇会写下更多剖白个人内心情怀的〈树犹如此〉之文。

白先勇与《孽子》：站在最前线的第三性作家

回顾起来，八十年代末白先勇接受《PLAYBOY》访问时首次公开谈论了自身的同性恋课题。在那时候，香港的同性恋仍属非法，同性恋者仍要负法律刑责——虽然英国本土早已将同性恋除罪化——白先勇那时候就勇于公开谈论同性恋课题，挑战法律，认为香港/东方社会实应突破有关法律盲区。每次白先勇谈论同性恋课题，都不是只单谈自己，更常把有关课题当成很严肃的社会问题去思考。

白先勇，可以说是众多东方同性恋者中最早、最主动以自己的性别倾向涌出社会底层的中国作家。此次的专访，我们的话题即围绕在白先勇针对同性恋而写的《孽子》一书谈起。

在访谈中笔者首先告诉白先勇说，作为勇于‘站出来’（come out）的同性恋者作家，他的人生历程自然比一般人来得迂回曲折。事实上，近年来被长久压抑在文明史深层结构之中的同性欲望，随着同性恋者‘站出来’挑战主流社会的单一性向模式而显得活跃，诗歌、小说、电影和戏剧等都有人想尝试挖掘这方

面的题材。而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今年也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和公众见面。

白先勇表示，《孽子》已得到台湾主流媒体公共电视的垂青，进行了大制作的连续剧拍摄工程，自今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台湾上演，他说：

“《孽子》以前曾经拍过电影版，如今电视连续剧版由非商业性的公共电视拍摄，在以商业主流的台湾电视媒体中可说意义非凡。我的期望有两点：第一，我希望能够感动人，不论是小说或电视剧，如果不感动人就失败了。第二，题材要能被大众所接受。按理讲，同性恋题材不容易处理，但导演拍得很自然，也就容易被人接受。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连续剧就是连续剧，有些地方难免会比较煽情，否则很枯燥的话，观众看不下去也不成；雅俗共赏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太严格地要求它像艺术电影。”

虽然白先勇并没有参与《孽子》电视连续剧的改编工作，但白先勇已从拍摄完成的前几集影带中，在观赏之后表示满意：

“这是台湾公共电视的一个大制作，导演曹瑞原很擅长拍摄电视剧，他对此剧的拍摄工作相当的认真，如龙子纽约那一段就拉队到纽约去拍多处外景。这套连续剧已拍了半年，很认真，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地方作了更改，而有些地方较通俗化，但从我看过前面已拍好的那一段来说，我觉得很感动。”

从白先勇的谈话中，他对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能够由台湾主流的电视公司改编为连续剧似乎感到相当安慰，许多演员都很有名，包括一些老演员，演员阵容鼎盛。白先勇更加高兴电视剧中

的《孽子》不只是讲述一群社会中的同性恋少年的故事，而是表现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悲情，认为主角阿青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结集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历史悲情：

“我觉得阿青相当具有台湾人的典型性，他爸爸是外省人、妈妈是台湾人；外省人的悲哀、台湾人的悲情，都集中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但又很不巧，他却是一个同性恋孩子，再加上社会整体的压力，因此阿青事实上是边缘、边缘又边缘的一个角色。我很高兴导演掌握到此点。我已预先看了两集，觉得整个气氛都蛮好蛮对的。”

当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时，作者最关注的莫过于剧本是否忠于原著，笔者自然也对此加以进一步追问。白先勇告诉笔者说，电视剧在整体故事叙事过程上很少改动，几乎多全一样，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改了。即故事开始的时候阿青被赶出学校，原是因为跟实验室一个管理员发生了性关系，但电视剧中却被改为和男同学发生性关系。多年以后，白先勇在另一座城市，一座当年他曾渡过年少时光的城里，慢慢回忆道：

“这一幕被改成阿青跟同学发生性关系，这跟小说的冲击很大，但我看了，觉得他拍得很好！逻辑也很通。当然，开始时我也并不完全认同，因为他将小说的原意改了，但经过我看了画面以后，觉得他拍得好，两个小孩子也演得好，画面很自然。这突然发生的关系，在导演熟练的感情下拍得很好。同学安慰着阿青，而阿青在故事中就是一个需要温情的少年，因此显得很自然。”

因此白先勇觉得电视剧内的改动是合适的，加上看电视的人并不一定看过小说原著，因而并无大碍。在原著中，全书起首这一幕实实在在是铿锵有声的一文字：当阿青的同性恋被揭发

后，愤怒的父亲在阿青身后追赶着，白花花的阳光照在小巷里，阿青赤着脚拼命狂奔，蓦地回头，只看到父亲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断挥动着当年身为团长所用过的自卫枪，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满布血丝的眼睛发射怒火，阿青只听到一种悲愤、颤抖和嘎哑的叫喊声音：“畜生！畜生！”这是非常有悲情力量的画面。

白先勇接受《孽子》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相信公共电视的制作是严谨的，是非商业的电视媒体，相信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也是严谨的；其次，白先勇知道导演的态度很严谨，不是立足于商业和取悦观众，而是真的想把小说原著的精神拍出来。白先勇分析道：

“我预先看了两集，我感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导演不光是讲一个同性恋，或者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把台湾的现实讲出来了。台湾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一个潦倒的老军人跟台湾舞女出身的女子结婚的不幸婚姻，这种台湾社会中独有的现实生活，仅两集都给拍出来了，重现六十年代的时代味道。然后阿青的妈妈跳舞，两个小孩子去看她，画面很现实，非常切合于台湾的现实写照、很动人。”

整体来说，白先勇很高兴连续剧的大部分情节都是照小说而编，把小说原来的味道抓得蛮准的，忠于小说的精神，是最让白先勇感到满意的地方。而白先勇对于《孽子》电视剧中突显台湾现实社会的时代背景显然也感到欣慰，然而他也没有忘了当初创作《孽子》的初衷：同性恋者的性别取向主题，以及和此有关的异性恋霸权社会中对‘同志’现象的关怀。谈到这里的时候，他很快主动地把话题拉到同性情爱之上。

白先勇告诉笔者，他同意同志现象在《孽子》中是一个很

重要的主题。事实上他在《孽子》中安置了一个安乐乡，让青春鸟 / 同性恋少年们休息避难。但在现实中，白先勇表示，传统上东方社会一向面对很大的社会压力，而同性恋者的一生更面对着很大的文化压力：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毅力、多大的勇气才能顶住社会的压力呢？他问道。这一番话，不仅让笔者感受到白先勇所可能面对的社会整体压力，也让笔者想起社会中众多同性恋者所可能面对的假面人生——带着面具的人格、独自在生活中承受社会压力。

在笔者整理白先勇此篇访问稿期间，笔者所身处的香港突然传来张国荣——一个公开同性恋 / 双性恋者的著名影歌星——跳楼自杀的消息。显然的，《孽子》中的安乐乡非没有出现在现实世界之中。张国荣的死亡事件，印证了白先勇所说的、第三性第四性所面对的社会压力有多么的复杂多么巨大，同性恋 / 双性恋者长久所面对的各种压力，确实根深柢固地成为东方社会深层结构中的梦魇。这些第三、第四性的群体，无法像异性恋人一般在情人节、在各种场合、或各种生命处境中，毫无压力地表现自己的真情，甚至往往生活在‘地下’、在幽暗的‘衣柜’空间之中。即使像张国荣那样已经不再是流落于社会边缘的青春鸟，他的自杀为我们的社会又增添多一宗非异性恋者的悲剧人生。

不过，白先勇认为，从公视能够把《孽子》拍成连续剧看来，这已经表现出台湾社会接纳同性恋的宽容态度。台湾公视能够开拍《孽子》，已经显示出一个很大的转变，可视为主流社会对同性课题态度的转变。即使在美国，也还没有一个很主流的公司像ABC拍过此种主题的系列。“因此，台湾的公共电视公司今天能够拍这个，我觉得转变已是很快了。”这转变显示台湾社会已经十分重视和包容同性恋现象。虽然也有个别嘲笑例子，但这是难以两全的。白先勇说，其实中国一直并不存在这个同志问题，根本从来连这个词都没有，但并不表示说中国社会是接受同

性恋，例如《红楼梦》里面贾宝玉跟蒋玉函有点交往就被打了。

原罪：爱是最大的救赎力量

在《孽子》中，白先勇建构一群同性爱恋群体的边缘世界，这是一个在被接纳的边缘之内的边缘世界。六十年代的台北，社会处处残留着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严峻气息，这一边缘少年的青春鸟们深入台北新公园的腹地，就像纽约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的黑暗领域一样，在人生旅途上跋涉，把命运交付给他们所创造的神话王国之中。这王国的历史十分暧昧，是极为隐密、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白先勇笔下所描绘的隐密王国，今日已经在各国各层面浮出社会地表。当日的社会边缘少年，今日在各地已不再是边缘人，而同性恋也不再是很大的禁忌。

白先勇回忆他最初写这本书时，主要是写被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物，但另一个主题就是一种救赎意识的阐扬。这是更高层次主题。今天白先勇回头看他这部小说，他发现这些少年身上实际都背负着原（original sin）罪的烙印，但他强调，这并非完全是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白先勇指出：

“由于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只是少数族群，古今中外都一样，永远被视为是异类。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里，其被接纳的程度可能有些差异，但大体上都被视为异类，非我族群。因此我所写的小说，也可以从宗教视角的层次去阅读。除非，我们的社会能包容整个人类；除非，众生平等；除非，我们都有大慈悲的胸怀，有普渡众生的承责；但在众生还未普渡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不能完全获得救赎。”

对于世界的救赎，白先勇进一步表示：

“人类要互相救赎才能有希望。只要还有一撮人被歧视、被压抑，那所有的人类都不可能被救赎。基督教如此，佛教也是如此。而所谓的慈悲和博爱，例如基督，他为每一个人包括同性恋者背负着救赎。这样看来，这本《孽子》是不是也具有这种宗教情感？”

白先勇很热烈地从宗教的角度去谈论他为社会边缘人所写的这一本小说，思考其中所可能隐含的宗教情怀。他认为佛教中的菩萨留在世上，就是为了普渡众生，不到最后一个人被普渡到彼岸，他不会成佛。白先勇发出无奈的笑声，提高声调反问：是不是要到那一天，当所有同性恋都被所有的社会都承认了，同性恋的诉求才会被认同？而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平等，真正被救赎？

白先勇对此提出一个力量饱满的见解：

“同性恋若能被救赎的话，救赎的力量就是爱。这种爱，包括异性恋的爱情，也包括同性恋的爱，以及亲情或其他一切爱的概念。这一种跨越异性恋的‘大写’的爱，才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一种救赎力量。”

这几十年来，《孽子》出版后社会已朝开放的方面发展，各种各样的运动不断兴起，一些异性恋社会也早已经十分开放，但是白先勇不认为那就表示异性恋情欲为主流的社会道德已经完全得到救赎。因此‘大写’的爱占有很重要的力量。他指出，异性恋社会也在寻找自己的救赎。开放性的社会是自然是同性恋寻求救赎的方式之一，不过白先勇认为，

“个人的救赎都得靠我们自己，同性恋者本身个人都要寻求自己救赎的方式。各种外在的、枝枝节节的东西恐怕都不是最决定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个人自己的救赎。”

从《孽子》的同性恋课题，笔者转到社会中的同性恋问题，想听听白先勇这方面较为整体的想法。《孽子》出版后这些年来，东方社会的改变很大，同性恋者的个人情感、爱情和情欲现象，如何和异性恋主流情欲论述配合发展却仍然面对不少问题。最要命的，自然是异性恋社会常常强调单一性向情欲的稳定性，而不容许其他形态的情爱模式，往往视之为异端。我们不禁会怀疑：异性恋主流所求的稳定性，是不是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骨子里却不能面对其他情欲形态的冲击，这对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的自我救赎有何影响呢？白先勇告诉笔者，现今社会的性别观念只能容许存在于我们所接受的社会道德之中：

“在性别的王国里，只能存在两种性别：第一性和第二性；而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也只能存在于第一性、第二性这两种性别的国度里面；第三性、甚至第四性则是一种异类、是非我族类。这使同性恋者背负着一种原罪。”

事实上，在性别的王国里，主流的性别观不外是单一性向观念，把人视为单一性取向的个体，而异性恋社会的二元对立体系更把‘异vs同’或男女简单对立；异性爱之外，其余的同性爱和双性爱不但没有生存空间，而且常被丑化。先勇有感而发指出，如果第三性或非异性恋者发出要求和叫喊的话，他们要求的就是整个社会能以‘人性的方式’去接受他们，而把同性恋者也视为一个‘人’、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白先勇有所感慨地指出：

“除非整体社会能以人性的包容去包容同性恋者，当这些所谓的第三性、或者非异性恋者都同样被视为‘也是人’的时候，才能得到救赎。例如《孽子》中的阿青后来跟傅老爷的关系，就是从原罪里得到救赎的一种表现吧。”

从‘原罪－救赎’的角度来讲，白先勇有很强烈的救赎自

觉。一向以来，传统的社会对于同性欲望和异性欲望充满各种迷思，两者不能并存。我们的文明只能允许扮演一个固定的性别，在截然二分中非此即彼。此种不允许兼容、中介、缓冲的性别文化特色，不容许男女的性别和情欲有一丝的暧昧、矛盾或灰色地带的模糊性（别），导致这种性别文化特色给社会带来不少的伤害。

早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白先勇就指出，他试图以虚构的小说人物去隐喻同性恋者，为当时对同性课题还是相当封闭的两岸社会作出呼吁：人生而平等，只有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性倾向，才能维持人格上的基本尊严。白先勇列举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名家大师，如苏格拉底、亚历山大大帝、柴可夫斯基、米开兰基罗到惠特曼等的经历加以勉励。白先勇讲出八十年代许多同性恋者——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同性恋者——内心的恐惧和疑惑。他在各种场合都一再表示，同性恋者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无需一辈子都在过着逃避现实的日子，不必一生都不敢面对自己，而过着双重的（假面）人生——当然更不必像张国荣那样选择自尽的方式逃避自己的宿命。同性恋者不必抱着低落的自我形象躲在社会边缘，不必在幽暗的角落过着‘衣柜’的双重生活。

台湾的隐喻：《孽子》预言式的时代载体

白先勇告诉笔者：他写《孽子》的时候并没有带着社会性的目的，一般来说，他说他写小说时都不带社会目的、或者社会运动。如果文学带有这些目的的话，其价值是暂时的。但文学是永恒的，应该是非政治性或非社会教化的表现。因此在小说创作上，白先勇自有自己的主张，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慢慢构思背后的意义和各种象征符号。当他在写小说的时候，白先勇说他最关心是否能把人物写活，这是最要紧的，至于背后有什么意义反而

不那么重要；也就是说，本文背后的意义有待读者或评论者慢慢去阅读出来。

那白先勇当初为什么写《孽子》呢？对这样一种主题的书有什么共期待呢？他说：

“一本书出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不是我所能控制或者负责得了。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这是最重要的。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写这些角色写得很深入。而我也对《孽子》的父子关系也很了解，但我不是从家庭的角度去讲故事，而是立足在父子伦理关系，一种最原始的关系之上。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父亲救赎儿子、儿子救赎父亲。我的意思是，人类若能互相救赎，才有希望。但严格来说，我现在有这想法，但并不表示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现实世界中异性恋社会的父子关系，落实到同性恋父子关系中，可能会有不同。白先勇说，他写傅老爷死了盖棺的那一场景，是小说里是很重要的一幕，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场。

面对白先勇心中如此重要的场景，笔者在此不妨将访谈的笔触悄悄移到多年前十二月的一个冬日黄昏，回到台北六张犁极乐公墓的小山顶上。那是一个夕阳赤红的滴得出血来的一个黄昏，血一般染红了遍山遍野。齐人高的狗尾草有如泡浸在血红的缸中，沉静静的墓地罩在无边无际的荒凉之中，赤烟滚滚。这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山径石级上传来，《孽子》中除了阿青之外另一个富有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人物王夔龙出现了，一双眼像两团黑火般燃烧，在傅老爷的灵柩前献花，默然俯首静静凝视十余分钟后，突然倒跪在墓前，高大嶙峋的身躯匍伏其上，头额抵地，高耸的双肩急剧抽搐着，恸哭声夹杂着痛苦的呼嚎，如一头受了重创的猛兽发出凶猛、高亢而凄厉的叫声。那是一种简直不像人

的哭声，是野兽在黑夜最深处的幽黯洞穴中朝苍天发出最后一声穿石裂帛痛不可当的悲啸。山头巨大的一轮血夕阳，把哭坟者照得全身浴血，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啸喊随沸沸滚滚的夕辉往山脚上冲流下去，一声声，在千莹百塚的山谷里激荡着，一声声。这场拜哭象征性父亲的写照，表现出一个仪式的完成，表现人的完整性和不完整性——这正是白先勇在文本建构中以一个化身（留美的王夔龙）的隐喻，去控诉社会的不义。

除了傅老爷此一场景外，白先勇告知笔者，《孽子》中他写得最满意的人物主要是阿青、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他弟弟四个人。这个家庭写得比较像台湾现实，一个外省的老军人，一个本省下层的一个妇女。夫妇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沟通，这些在电视剧中都拍出来了。台湾这种家庭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是蛮多的。在他眼里，阿青跟弟弟的感情是动人的。这对同胞兄弟，妈妈出走后他们相依为命，弟弟死了以后，阿青伤心得不得了，后来他一直照顾其他和他弟弟相似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感情的投射。白先勇说他比较着重此一时代社会特色，同时也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这可能和别的有关同类小说不同的地方。

“《孽子》中这样的婚姻，这种家庭，在台湾社会层面中十分写实。我当时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现在想来反而切合台湾的现实。小说变成预言式的时代载体，反而变成了一种台湾的隐喻了。阿青这个小孩子有点像台湾，整个文本隐然像中华民国的历史压力，他当然无法承受，这个小岛也受不了历史的压力，所以他们会排斥中华民国过去的历史也有道理，这个重担毕竟太重了。”

后来阿青得到他妈妈认同，白先勇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母子两个都同样过着飘泊的命运。本来他妈妈不喜欢、不爱他，母子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母子之间突然产生一种同情。